



中国环保事业的守望者 曲格平

A Watchman of Chinese Environment

撰稿 / 范进

“没有一个清洁美好的环境，再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无意义。”这是中国“环保之父”曲格平曾说过的名言。如今的中国人似乎更能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。“沙尘暴”“雾霾中国”“水污染”，这些耳熟能详的词语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，自然环境恶化程度已经切实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。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。

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，查遍中国所有的词典，都找不“环境保护”这个词，人们只知道有“环境卫生”和“环卫工人”的概念。这时，有一个人建议把“环境”和“保护”这两个在当时人们的意识里毫不相关的词组合到一起，这个人就是曲格平。他是中国环境保护的第一人，这位坐拥世界众多荣誉与光环的老人，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谦虚地说：“其实我个人的生活很平淡，而整个中国的环保事业却波澜壮阔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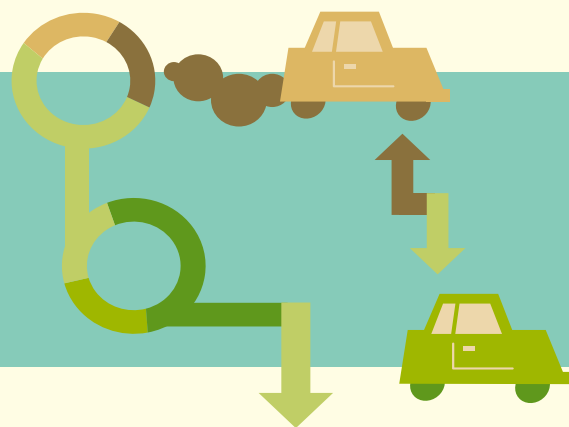
或许正如他所说，这份“波澜壮阔”的事业由他而起，也照亮了他的精彩半生。

改变命运的决定

1930年出生在山东肥城的曲格平，看起来和普通人并没有两样。22岁时他从山东大学文学艺术系毕业，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得到了第一份工作。后来几经调任，42岁时他已经是化学工业部生产技术司处长。那时，任谁也想不到，他的人生即将与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联系在一起。

1972年，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。而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十年动乱的漩涡中，整个国家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，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，对于环境问题更是无人过问。但这时，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点出现了：周恩来总理决定派出一个中国代表团去参加这次会议。这个后来被曲格平称赞为“高瞻远瞩”的决定，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曲格平正是被派去的代表之一。但那时的中国人，甚至连环境问题的科学定义都不清楚。更糟糕



的是，大家都把环境问题当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，认为和中国的关系不大。在那次环境会议上，中国代表更多关注的是和美国的政治斗争，对美国在越战中一系列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抨击，对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却了解不多。据曲格平回忆，他们交出的第一份报告是“满纸政治斗争，没见到一句环保。”

短短 10 天的会议，最后却给中国带回了个崭新的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思想：环境保护。与会代表们惊异地发现：当时中国所理解的环境问题和其他国家所谈论的环境问题并不一样——中国认为环境问题只是局部的工业三废（废水、废气、废渣）污染，而其他国家谈论的更多的却是生物圈、水圈、大气圈、森林生态系统等“大环境”“大问题”。

回国后，代表们把大会列举的环境问题与中国的现实一对照，忽然发现在很多方面中国的问题并不少于资本主义国家。而曲格平的心里更是不能平静。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，示威者抬着因环境污染而身患残疾的受害者，这种场面让他久久难以忘怀，他突然意识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。会后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，曲格平总结道：中国城市和江河污染的程度并不亚于西方国家，而自然生态破坏的程度远在西方国家之上。这次会议开启了他心灵的另一扇窗，他决心进入一个全新而神圣的领域——

发展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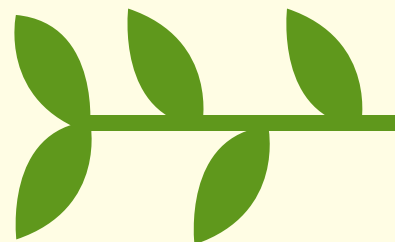
1973 年 8 月 5 日，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，中国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会议。从此，环境保护在中国被正式列入议事日程，中国的环保事业终于蹒跚起步。回忆起这件事，曲格平总是激动地称是周恩来总理的功劳。“如果没有周总理的重视和支持，中国的环保事业也许要晚起步 10 年。”

四十年的心病

2013 年 12 月 14 日，83 岁的曲格平在“沃尔沃 2013 中国梦践行者盛典”的讲稿中，公开了一个故事：20 世纪 70 年代初，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发布过一个十年环境污染治理规划：用五年时间控制环境污染，用十年时间解决环境污染问题。

这是当时并未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，而做出的草率规划。如今四十年过去了，目标不仅未能实现，环境污染却愈演愈烈。这件事被曲格平喻为“四十年的一块心病”。

1976 年，曲格平来到了内罗毕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首任代表。在那里，曲格平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开阔，他如饥似渴地查阅发达国家保护环境的资料，全面地了解国际社会先进的环境治理经验和方法，思考着中国的环保之路究竟如何走。





曲格平发现，工业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走“先污染、后治理”的道路，比如曾经烟雾弥漫的雾都伦敦，70年代后再没有发生过烟雾事件；泰晤士河一度被称为“臭水沟”，莱茵河曾被称为“欧洲下水道”，但后来它们都相继变清；就连有“公害列岛”之称的日本，许多河流和城市的环境状况也都有明显改善……

然而曲格平注意到，这些成就的取得，是以巨额资金和人民健康为代价的。对于人口众多、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，这条“先污染、后治理”的道路或许行不通。但今天看来，中国并没能摆脱“先污染、后治理”的老路，有些方面甚至比国外更为糟糕。

70年代，风景秀美的漓江被污水染成一条不堪入目的黑流。当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：如不解决漓江污染，将功不抵过。但依据当时的普通治理措施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把所有漓江沿岸的工厂都关掉。当时一共有30多家工厂，包含广西桂林市的全部骨干企业。最后国务院采取了关掉工厂的办法。这个措施带来的损失不小，而且也引起了当地企业的强烈反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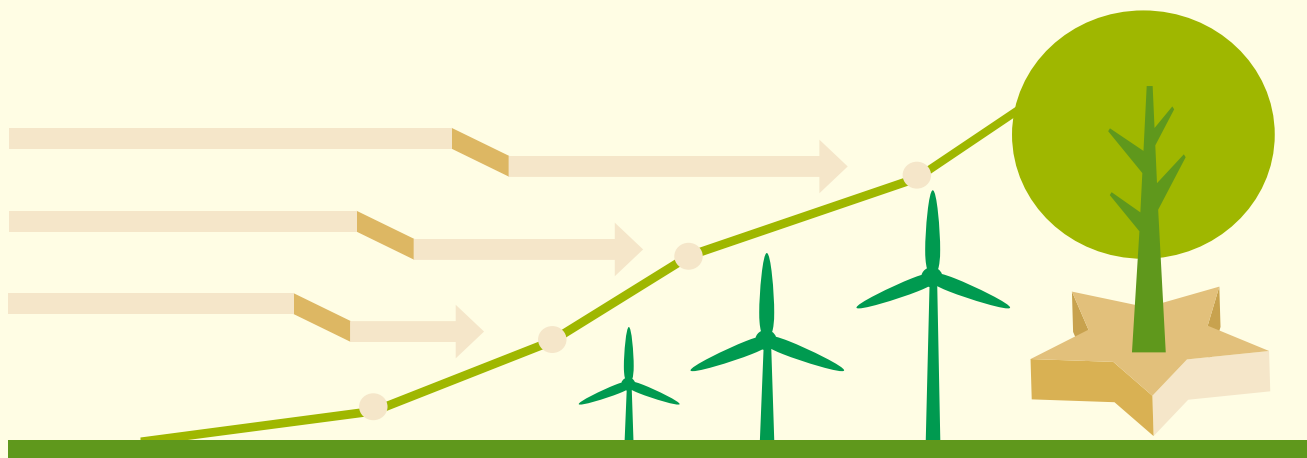
1979年，在曲格平的大力呼吁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正式出台，结束了中国没有环保法的历史。1983年，“环境保护”被正式列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，环保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。然而，有了法律与政策，如何落实，却



成了一大问题。在曲格平看来，环保事业看似在保护一些东西，但要推行起来，却是困难重重，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。正如漓江关停30多家工厂这件事的启示一样：环境保护需要和经济发展、社会发展相配合才行，而中国应该走一条自己的环境保护之路。

一次美好的行动

也许在1988年曲格平担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的时候，他就有过这样的想法：通过新闻媒介，用舆论揭发破坏环境的行为，让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。1993年，曲格平调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



任，他开始着手实施这一酝酿已久的想法，这就是后来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开展实施的“中华环保世纪行”活动。

这个想法一出台，立即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和各级新闻媒体的响应，参加这一活动的记者最初就有几千名，后来进一步扩大。曲格平还记得当时朱镕基总理的原话：“有些事不批评、不曝光，不好推动。”一般在类似事件曝光之后，国务院就立即开会，拿出整治措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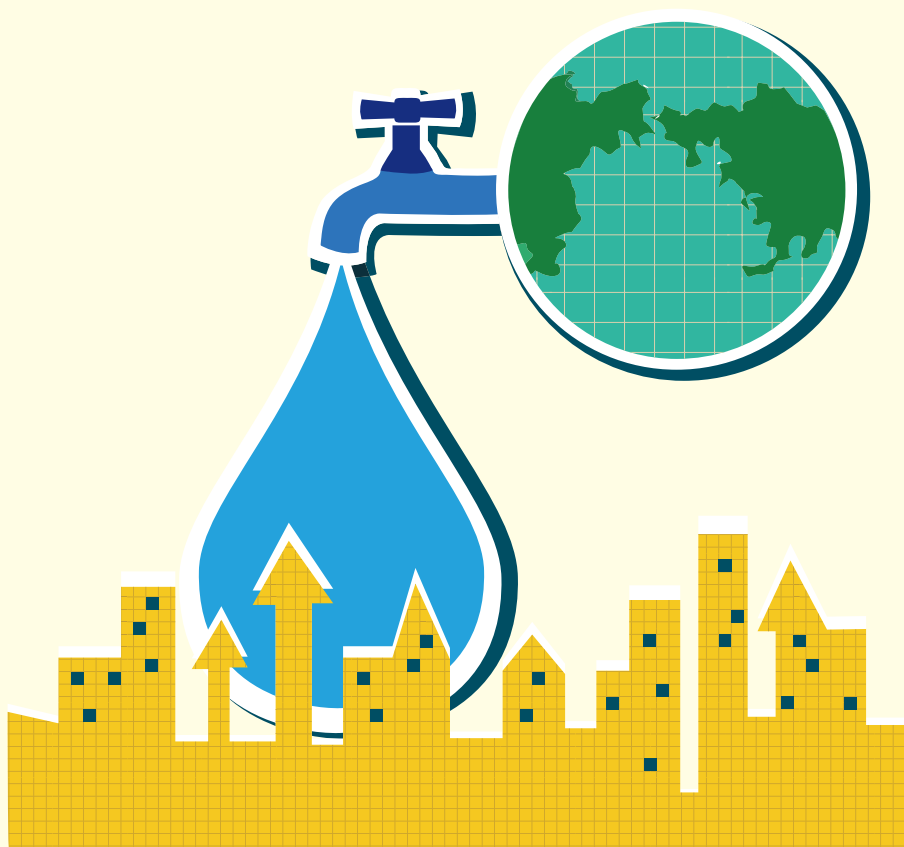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行动进展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很快就来了问题。许多记者在讨论会中反映，他们不敢报道，因为稿子发出去了之后，风险太大，会招致其他部门的责难。曲格平当即表态：“中华环保世纪行”是由13个部门组成的一个组委会，曲格平是组委会主席，这件事情是组委会叫大家做的，如果出了事，你就说曲格平让我做的！

“当时这个话要不说的话，他们真是不敢做了。”曲格平后来回忆说。

道路漫长

1989年的政治风波刚刚过去不久，曲格平作为当时第一位应邀访华的部级干部，赴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保护臭氧层部分环境部长会议。

会议时间到了，曲格平最后一个走进大厅，这时整个会场静极了，曲格平正在走向自己的坐席时，多年的同行和老朋友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、大会主持人托尔巴博士来到曲格平身边，热烈地拥抱了他并爽朗地介绍说：“曲先生，相信大家一定很熟悉，他就是拥有12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环境部长。我们对他的贡献表示敬意。”



掌声再次响起来，并且久久地回荡在会议大厅里，曲格平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。在那次大会上，曲格平还被选为大会副主席，他发言的许多观点，被直接列入会议最后通过的文件中。

在曲格平的环保生涯中，像这样崇高的荣誉是第一次。而曲格平关注的却不是这些光环，他看到的更多是中国环保事业的艰巨性和长期性。他像一个蓝天白云下的守望者，时刻关注着这个国家生态环境的前途命运。⑤